



敦煌

服饰文化

研究

DUNHUANG FUSHI
WENHUA YANJIU



竺小恩 / 著

从十六国到蒙元时期的敦煌壁画中，有褒衣博带的汉族衣冠服饰，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衣冠服饰，有葱岭以东西域诸国的服饰，有葱岭以东南亚、中亚、西亚等异域服饰，还有东邻诸国，甚至非洲黑奴的衣冠服饰。这些衣冠服饰荟萃于华戎所交之敦煌，既反映了多民族国家衣冠服饰的丰富多彩，也体现了各民族服饰文化的相互交流与相互融合。敦煌石窟实为世界服饰文化研究之宝库。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敦煌
服飾文化
研究

竺小恩 /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服饰文化研究 / 竺小恩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308-08685-1

I. ①敦… II. ①竺… III. ①敦煌学—服饰—文化—研究 IV. ①K870.6②TS94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0524 号

敦煌服饰文化研究

竺小恩 著

责任编辑 朱 玲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75

彩 插 16

字 数 265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685-1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前 言

敦煌,是古代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是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汇聚之地。

敦煌石窟是世界文化艺术研究的宝库,更是古代民族服饰的博物馆。从十六国到蒙元时期的敦煌壁画,尤其是莫高窟壁画中,既有褒衣博带的汉族衣冠服饰,也有西北、北方少数民族的衣冠服饰,还有南亚、中亚、西亚等西域诸国,以及东邻诸国,甚至非洲黑人的衣冠服饰。这些衣冠服饰荟萃于敦煌这一华戎所交之都会,既反映了多民族国家衣冠服饰丰富多彩的特点,也反映了各民族服饰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关系。

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曾经说过:敦煌佛教艺术是在我国中原艺术传统、河西走廊本土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了西域各地和印度、波斯等外国艺术影响之后,创造出来的具有中华民族气派的民族造型艺术体系。敦煌文化真正的灵魂是西域文化、中原文化以及二者交融为一所凝结成的本土敦煌文化。没有本土性,敦煌文化就无法扎根。敦煌服饰文化也是在敦煌本土服饰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中原服饰文化、西北及北方少数民族服饰文化、西域各地服饰文化之后而形成的。

敦煌服饰文化主要以壁画的形式体现出来。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宗教人物服饰,如佛、菩萨、天王、力士等,这类人物的衣冠服饰往往混杂中外,甚至加入一些想象的成分,因而与现实人物的衣冠有一定的距离。另一类是世俗人物服饰,如故事





画、经变画中的人物服饰,特别是供养人像,都是有名有姓的现实人物的写照,因此,它对于研究我国衣冠服饰发展演变的历史,是具有极强的科学性的。

本书主要是以敦煌莫高窟故事画、经变画、供养人画像中世俗人物服饰为依据,探讨两个问题:一是对北凉、北朝(北魏、西魏、北周)、隋代、唐代、五代、宋、西夏、蒙元等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人物的服饰作些切实的分析和研究;二是以敦煌本土服饰文化为核心,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探讨从十六国到蒙元时期中原、西北及北方少数民族、西域(包括中亚、西亚、南亚)以及东邻诸国等诸多民族、诸多地区之间的服饰文化交流盛况。

全书共分8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到第八章分别论述十六国、北朝、隋代、唐代、五代和北宋、西夏、蒙元等各个时期的敦煌壁画服饰文化。

本书旨在突出3个方面:一是系统性。以往研究敦煌服饰文化的成果很多,但大多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本书试图以历史发展为线索,从十六国北凉开始,一直到蒙元时代,对这一期间的敦煌壁画中世俗人物服饰进行逐一的系统的研究。二是形象性。整本书配以大量的壁画原作和逼真的临摹作品。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增加研究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在于为广大的服饰文化爱好者和研究者认识、了解、研究古代中西服饰文化提供珍贵而形象的资料。三是深刻性。本书意欲在前人对敦煌服饰风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探讨服饰文化繁荣发展的规律:一个民族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需要与其他民族的服饰文化进行交流,在保持民族服饰文化本土主体性的同时,通过能动的选择与改造,将外来服饰文化的精英消化吸收。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更新更美的民族服饰文化。

竺小恩

2011年2月17日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 第一节 敦煌文化的诞生 /1
- 第二节 敦煌与西域 /3
- 第三节 敦煌与中原文化 /7
- 第四节 敦煌与佛教东渐 /11
- 第五节 敦煌莫高窟世俗人物服饰概况 /15

第二章 十六国时期的敦煌服饰文化 /20

- 第一节 十六国时期的敦煌 /20
- 第二节 早期三窟世俗人物服饰 /23
- 第三节 褒衣博带:中原风韵 /26
- 第四节 靴帽裤褶:胡地习俗 /28

第三章 北朝时期的敦煌服饰文化 /35

- 第一节 北朝时期的敦煌 /35
- 第二节 莫高窟北朝壁画概述 /40
- 第三节 北朝壁画世俗人物服饰 /44
- 第四节 辫发戴帽,裤褶革带——鲜卑民族的传统服饰 /55
- 第五节 褒衣博带,大冠高履——中原南朝的服饰风尚 /62
- 第六节 兼容并包的服饰审美风格 /72



第四章 隋时期的敦煌服饰文化 /76

- 第一节 隋时期的敦煌 /76
- 第二节 莫高窟隋代壁画概述 /81
- 第三节 隋代世俗人物服饰 /86
- 第四节 隋代服饰两大体制 /92
- 第五节 西域服饰文化对隋代服饰的影响 /99

第五章 唐时期的敦煌服饰文化 /105

- 第一节 唐时期的敦煌 /105
- 第二节 莫高窟唐代壁画概述 /110
- 第三节 唐代壁画世俗人物服饰 /117
- 第四节 幞头靴袍——胡气氤氲的大唐男子服饰 /130
- 第五节 罗衫裙帔——艳丽多姿的大唐女子服饰 /140
- 第六节 莫高窟唐代壁画中的胡服 /148
- 第七节 莫高窟唐代壁画中的吐蕃服饰 /159

第六章 归义军曹氏政权时期的敦煌服饰文化 /165

- 第一节 归义军曹氏政权时期的敦煌 /165
- 第二节 莫高窟曹氏画院时期壁画概述 /168
- 第三节 曹氏画院时期世俗人物服饰 /172
- 第四节 曹氏画院时期敦煌贵族妇女服饰 /182

第七章 西夏时期的敦煌服饰文化 /193

- 第一节 西夏时期的敦煌 /193
- 第二节 西夏时期敦煌石窟艺术 /196
- 第三节 西夏壁画世俗人物服饰 /198
- 第四节 沙州回鹘时期敦煌石窟中的回鹘服饰 /211
- 第五节 西夏党项族服饰 /216
- 第六节 党项族服饰:多民族服饰文化的融合 /223

第八章 蒙元时期的敦煌服饰文化 /232

第一节 蒙元时期的敦煌及石窟艺术 /232

第二节 蒙元壁画世俗人物服饰 /235

第三节 蒙古族男子服饰 /238

第四节 蒙古族女子服饰 /246

第五节 各民族服饰对蒙古族服饰的影响 /251

主要参考文献 /256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敦煌文化的诞生

敦煌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端,南接青海,西连新疆,连接着东西交往的丝绸之路,自汉代以来就一直是东西交通的枢纽。

春秋时代,敦煌是秦的属地,当时叫做“瓜州”,又称“陆浑”,主要为羌戎所居。战国时代,敦煌为月氏所占领。秦汉之间,强悍的匈奴攻破月氏,敦煌开始了匈奴统治的时代。汉初,匈奴的势力进一步强大,并不断侵扰汉朝边境。汉武帝刘彻即位后,由于国力强盛,在对待匈奴的策略上由原来的“和亲”转为军事攻击,开始反击匈奴,并取得了胜利。公元前111年(武帝元鼎六年),汉朝在原武威、酒泉二郡的基础上,分置张掖、敦煌二郡,称为“河西四郡”。河西四郡的设置,切断了匈奴和羌的联系,打通了内地通往西域的大道。此后又在敦煌郡西修建了阳关和玉门关,扼守由西域进入河西和中原的大门。为了巩固对河西四郡的统治,汉朝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调发大批士兵屯戍;二是移民实边,迁徙大批内地贫民和囚犯来定居。这样一来,不但改变了河西地区的民族布局,成了胡汉杂居之地,而且发展了河西地区的生产。敦煌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西汉末年由于王莽改制,中原时局混乱,而河西地区则富庶平安,一些大族为了避乱纷纷西迁,定居河西,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两汉之际,北匈奴的势力又重新扩张起来,并取代汉朝在西域的统治,成了西域地区的霸主,并侵扰着汉朝北部的边郡。东汉初年,由于国力薄弱,不仅无力阻止北匈奴的侵犯,而且也无能力经营西域,西域都护只好退居敦煌,而





西域各国入朝的王子也都留居在敦煌。敦煌作为中原的门户，“进断北狄之觐途，退塞西夷之窥路”^①，其作用进一步显示出来了。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引发了军阀混战，中原处于大乱之中；而河西一带却保持了长期的和平局面，两汉的儒家文化在中原受到了摧残，而在河西却得到了稳步的发展。三国时期，仓慈、皇甫隆等先后任敦煌太守，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譬如：改进耕作技术，发展农业；抑制豪强，抚恤贫羸；鼓励国内外商人来敦煌贸易，从而促进了与西域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敦煌又成为丝绸之路上一处极为重要的商品交易中心和粮食生产基地，成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②。

十六国时期，敦煌继续保持繁华的形势。前凉文王张骏在位时（307—346年），把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等三郡三营合为沙州，州治设在敦煌，敦煌的地位又有所提高。400年，敦煌太守李暠称凉王，建立西凉政权，以敦煌为都城，并以汉儒之制建立泮宫，兴办学堂，大力发展了文化事业。十六国时期先后统治敦煌的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政权都与西域的关系密切，当时的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管辖万里”，^③西域各国的使节、商人、僧侣联翩而至，敦煌已成为中国西北经济、文化荟萃的重要都会。这样就给随丝路贸易而来的佛教扎根敦煌奠定了基础。

自西汉末年开，佛教自西域传来，以本地文字传译佛经，其势力以入乡随俗的方式逐步传播至我国的河西、陇右，那已是东汉晚期了。以后又经河西、陇右，再进一步深入至关中、中原、江南等地。从佛教传入玉门关以后，就有僧人行禅，僧侣们在断崖岩壁处凿窟习禅，修行传教。佛教之所以能在敦煌兴起，还与十六国晚期民生的疾苦磨难有着极大的关联。十六国晚期的割据征战使河西社会陷入苦海。421年，一向护持佛教的沮渠蒙逊灭西凉时，以水灌敦煌城并屠其城，安定祥和数百年的敦煌顿显破败景象。佛教信徒在人生痛苦、人间灾祸面前对佛教更是深信不疑，佛教成了众生们的一种精神依托，他们追随西域名僧学经、坐禅、建寺、供养，这样，从魏晋到隋统一年间，在敦煌，佛教扎根于民间，并遍及城乡。

① 魏收：《魏书·韩秀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② 班固：《后汉书·郡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③ 房玄龄：《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中华书局1996年版。



时局的相对稳定,丝路的畅通,农业经济和商贸经济的繁荣,中原文化的熏染,西域佛教文化的传入,敦煌文化便是在这诸多因素共同合力作用中诞生并逐步发展、繁荣起来的。

第二节 敦煌与西域

自汉张骞通西域以后,敦煌与西域的关系一向十分密切。

古代称为“西域”,泛指阳关、玉门关以西的地方。主要指天山南北各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别是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四周;中亚各地(今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各共和国境内)。在当时人的观念中,西域还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不丹、锡金、波斯、罗马,甚至整个欧洲以及非洲东部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但主要指天山以南和中亚各地的许多国家和部落,例如中亚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一些粟特人国家:康、安、石、米、史、何、曹等“昭武诸国”,大宛(今费尔干那盆地浩罕城一带),迦湿弥罗(今印度、巴基斯坦之间的克什米尔地区),大月氏等。天山南路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各国和部落,在历史上比较重要,并和敦煌关系密切的主要有高昌(今吐鲁番)、于阗(今和阗)、龟兹(今库车、拜城)。西域的这些国家和部落,在古代中西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中都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西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在唐朝以前主要是通过南北二道丝绸之路完成的。《汉书·西域传》卷96:“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无论南道还是北道,商旅使者东来西去都必须经过敦煌,敦煌成了中西交通的枢纽。虽然几经战乱,但它始终是中国和西域各国交通的咽喉之地,也是东西经济和文化汇流的交叉点,地位十分重要。

自汉以后,历经十六国、北朝、隋代、唐代等,都曾经营过西域,也都以敦煌为经营基地和出发点。

十六国时期的河西诸政权为了从西域得到政治、经济上的支持,都很重视对西域的经营。前凉时期在河西恢复了货币流通,贸易随之通畅,西域商品大量流入河西;张骏在任时在敦煌设置州治,对西域进行着有效控制。前



秦时曾派吕光经营西域,在他返回时带回西域及西方物产、伎艺,使之东传,对东西方物资、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作用。西凉立国之初,敦煌地区仍然与西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北凉攻占敦煌后“鄯善王比龙入朝,西域三十六国皆诣蒙逊称臣贡献”^①,这一时期,武威、张掖、敦煌等地是主要的商贸城市,中亚粟特商人来往各城,商业活动十分活跃,《北史·西域传》载:“其国(粟特)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十六国时期的敦煌是经营西域的基地,是丝绸之路上的国际商贸中心^②。

北朝时期敦煌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在丝路贸易中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北魏时期,为控制北凉旧地,在河西凉州和敦煌设镇,为打通西域交通,5世纪40年代魏太武帝派成国公万度归率军接连向鄯善、焉耆、龟兹用兵,西域大部为北魏所控制,丝路南道打通。“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赴,胡商贩客,日奔塞下。”^③5世纪90年代灭柔然后,丝路北道也畅通无阻,首都洛阳成为波斯、天竺等各国商人、使者云集的地方。

西魏、北周时期,河西敦煌相较北魏更是处于全面复苏与繁荣阶段。商业的繁荣、丝路交通的空前畅通是当时经济繁荣的一大表现。尤其是北周,统治者为了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推行“结姻于北狄”,“通好于西域”的政策,因而,“弁服毡裘,辐辏于属国,胡商贩客,填委于旗亭。”致使贡使往来频繁,胡商不绝如缕,大量胡人定居于河西,丝绸之路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隋代敦煌的繁荣,离不开隋朝对西域的建设和中西交通的发展。隋文帝时西域与中原王朝的隶属关系就没中断过;到炀帝即位后,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地经营西域。一是命令吏部侍郎裴矩专掌经营西域之事,裴矩不负所望,写成《西域图记》,提出了经营西域的宏伟方略,勾勒了从丝路咽喉敦煌出发到达地中海的北、中、南3条丝路通衢,为炀帝开放河西,经略西域,进而实现“混一戎夏”战略提供了决策依据。二是重创铁勒,平定吐谷浑,为重新畅通西域之路扫除障碍。三是炀帝亲巡河陇,威慑西域,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

① 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北凉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② 杨秀清:《华戎交会的都市——敦煌与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 杨銜之:《洛阳伽蓝记》卷3,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



等四郡,并命刘权镇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扞御敌人,确保丝路畅通。总之,炀帝为经营西域、巩固隋朝在西部广大地区的统治,在人才选用、军事征讨、亲临威慑、财源供给等方面都曾有缜密的安排。以致中原与西域之间的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隋炀帝统治的大业年间,西域高昌、康国、安国、石国、焉耆、龟兹、疏勒、于阗、拔汗、吐火罗、挹怛、米国、史国、曹国、何国、乌那曷、穆国、漕国等“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①

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最强大的统一时期,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丝绸之路”的畅通,唐王朝在河西派驻了大量边防军,即《唐书》中所谓“河西十军”。围绕凉州就驻有赤水军、建康军、大斗军、宁寇军等,以保障河西首府和对外贸易市场的安全。唐初西域商胡云集河西,多先至凉州贸易。贞观初年,玄奘西游,路过凉州时说:“凉州为河西都会,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在敦煌西面有一个石城镇,居住着大批康国商人。敦煌西面百里有“兴胡泊”,是从玉门关道往还的商胡居止之地。为了便利中外商旅使者,沿丝路均设有驿站,接待过往客使。同时还有瓜州的墨离军、沙州的豆庐军以及连绵不断的烽燧亭戍,以扼守西关,维护中西交通。唐代壁画中反映中西交通的画面更多,在《化城喻品》中,有婆罗门牵着满载货物的大象,穿山越谷而来;特别是莫高窟第45窟盛唐时代《观音经变》中的《胡商遇盗图》,画一群胡商,赶着毛驴,载着丝绸,于山谷中碰上强盗拦路抢劫,商队中之为首者,高鼻深目虬髯,戴白毡高帽,穿贯头衫,大概就是波斯商人。汉唐以来,中亚、西亚商贾往来不绝,而波斯商人在丝路贸易上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是他们把珠宝运来中国,又把丝绸等物品运往欧洲。

而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过往商胡、使节、僧侣,还有经波斯、大食辗转而来的昆仑奴等络绎不绝,他们或留在河西,或经河西敦煌走向京都长安和其他城市;摩尼教、景教、袄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亦经河西敦煌流播到中华大地的角角落落;中亚乐舞艺术家与天竺杂技、魔术艺人在河西及长安各阶层中亦大为活跃、大受欢迎。《唐六典》记载了开元年间与唐交往之蕃国:

^① 魏征:《隋书》卷83《西域传》,中华书局2008年版。



凡四蕃之国，经朝贡已后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存者，有七十余蕃。谓三姓葛逻禄，处蜜，处月，三姓咽蔑，坚昆，拔悉蜜，窟内有姓杀下，突厥，奚，契丹，远蕃靺鞨，室韦，和解，乌罗护，乌素固，达未婁，达垢，日本，新罗，大食，吐蕃，波斯，拔汗那，康国，安国，石国，俱战提，教律国，罽宾国，东天竺，西天竺，南天竺，北天竺，中天竺，吐火罗，米国，火寻国，骨咄国，河毗施国，曹国，拂菻国，勃时山屋驮国，狮子国，真腊国，尸利佛誓国，婆利国，葱岭国，俱位国，林邑国，护密国，恒没国，悒恒国，乌苾国，迦叶弥罗国，无灵心国，苏都瑟那国，史国，俱密国，于建国，可萨国，遏囉国，习阿萨般国，龟兹国，疏勒国，于阗国，焉耆国，突骑施等七十国。

大唐王朝灭亡后，藩镇割据，各立王朝。张承奉取归义军称号，建立西汉金山国，不顾自己的国力和军事势力，举兵征战，西讨东伐，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特别是与甘州回鹘成为敌对关系，最后被甘州回鹘击败，金山国成为甘州回鹘的附国。曹议金取代张氏归义军政权后，河西瓜、沙两州先后经由曹氏5代8位节度使统治，长达120余年曹氏归义军统治敦煌时期正是五代、北宋时期。

曹氏归义军时期，瓜、沙统治者为了改善与周边民族的关系，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曹氏祖孙几代与回鹘、于阗等西域诸国连结姻亲，或嫁女于回鹘、于阗，或娶亲于于阗、回鹘，以解除东西两面的后顾之忧，打通丝绸之路和前往中原的通道。同时，曹氏政权还与北方的辽、金，与西州回鹘亦都交往频繁，和睦相处。于阗使、西州使、甘州使、回鹘使等等各路使者往来不绝。

西夏时期由于长期与宋廷为敌，不准西域各国通过敦煌与河西向宋朝贡，对过境商人也课以重税，迫使西域各国使者和商人避开西夏辖区，改由塔里木盆地的南沿经青海进入中原，或改道从中亚到蒙古的草原之路，敦煌在西夏时期逐渐失去中西交通咽喉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转站的重要地位，其商业和文化也渐趋衰落。

自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以后，他及其继承者在亚洲以及欧洲的广大地区进行长期的征战，不断扩大蒙古国的疆域，进而将东起鄂霍次克海、西至多瑙河的多民族居住地区连成一片。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蒙古大帝国，在其辽

阔的疆域内,建立起完善的驿站系统,从元大都或中国其他城市到中亚、波斯、黑海和黑海之北的钦察草原和小亚细亚各地,都有驿道相通。通过四通八达的驿站,以及伸向南海、印度洋的远洋航线,使亚、欧、非许多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和习俗的民族,从此有了广泛的交流。

西夏时期曾失却了中西交通咽喉和中转站的重要地位的敦煌,在元蒙时期又逐渐开始得到了重视,元代政府于1280年升沙州为沙州路总管府,辖瓜州,并先后辟玉门关通道,重开丝绸之路,于沿途设置驿站。畏兀儿人、回回人、波斯人,还有匈牙利人、弗莱曼人、俄罗斯人,甚至还有英国人和法国人经由河西敦煌来到中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波斯回回人大批东来,他们中有大量被征的军士、部族首领、使节、工匠、商贾、学者、教士,随着波斯回回人的东来,回教系的学问、技艺、文物、衣食亦随之传播到元朝,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中华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流又呈现出绚丽多姿的景象。

第三节 敦煌与中原文化

自从西汉王朝逐走匈奴,在月氏故地建立河西四郡以后,敦煌和中原便发生了更为直接的关系。汉王朝的屯戍徙边政策,驱使大批的戍卒、罪人来到敦煌。一些犯罪的土族、官僚、大地主,多是举族西迁。他们不但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后来王莽改制、三国分裂、八王之乱(300—306年)、永嘉之乱(311年)、西晋灭亡(316年)、晋室南迁(318年)等中原动乱时期,都有大批士人逃到河西,进一步加强了敦煌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促进了敦煌儒学的发展。敦煌的一些世家豪族,如张、翟、李、索、阴、阎、阚、曹、令狐、宋、罗、刘等豪姓,都是从内地迁逃而来的。这些人与当地的土著居民一起,构成了古代敦煌的阶级、阶层和生产关系,也奠定了敦煌主体文化的基础。

3世纪前后,敦煌已开始 在 驰誉中原的河西文化中崭露头角。如东汉的张芝、晋朝的索靖,都是全国著名书法家。经学大师郭瑀、宋纤、刘昉等在河西徙徒往往达数百千人。阚骃、索敞、宋繇、张湛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儒家学说成了当时敦煌地方的主要统治思想。道教思想在当时也十分活跃。梁僧祐的《弘明集》已记有汉代道士在敦煌活动的情况,在后世出土的汉晋简牍



文书以及敦煌遗书中也有许多足以证明道教在敦煌流行的证据。其他各行各业也都有出众的代表人物,如针灸师张存、音乐家索丞、军事家索班、曹宽、张奂等。

十六国前期,北方虽然群雄逐鹿,但相对于中原混乱不堪的局面,河西还是处于比较安定的环境中,《晋书》卷86《张轨传》对此有记载:“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中外避难来者,日月相继。”这中间有大量的学者士人,他们在河西传授儒学,对中国文化承前启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西凉国王李暠据敦煌自立时(405—416年),曾修筑过靖恭堂、谦德堂、嘉纳堂,其中绘有以圣帝、明王、忠臣、孝子、义姑、节妇为题材的壁画,不但反映出中原文化的影响,而且表明当时敦煌的建筑和绘画技术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曾说:“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随、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此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又说,“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魏、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可见以敦煌为主导的河西文化不但完整地保存了汉晋传统,而且还对北朝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北朝时期,鲜卑民族入主中原,河西敦煌先后历经了北魏、西魏、北周的统治。北魏统治者一向仰慕中原文化,入主中原以后,积极主动地学习先进的汉文化。以孝文帝元宏言,他为了巩固鲜卑贵族统治,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全面推行汉化政策。譬如在服饰制度上,任用南朝士大夫王肃等制定礼仪,并用刘昶和平齐户蒋少游等按汉晋制度制定五等公服及百官六官衣冠。元宏自己首先“服袞冕以朝飨万国”。太和十八年(494年)下令禁穿鲜卑服,改着汉装。尽管鲜卑贵族中有人反对,而且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也很难一时扭转,但在统治者的强力提倡下,鲜卑族的服装起了很大变化,“褒衣博带,大冠高履”的汉晋衣冠,在北方蔚然成风。而直接将这种改革后的褒衣博带羽仪服饰等中原文化带至河西敦煌的是魏明元帝四世孙东阳王元荣。

元荣出任瓜州刺史治理敦煌时间为北魏孝明帝孝昌元年至西魏文帝大统十一年(525—545年)。他不仅是莫高窟的建设者,而且是将中原文化带到



河西敦煌的传播使者。元荣任职敦煌期间,敦煌莫高窟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洞窟形制到壁画内容、艺术风格都有新的发展,南朝“秀骨清像”的画风,以典雅高洁的格调出现在壁画上,而且伴随着“秀骨清像”画风的还有“褒衣博带”中原服饰风格。西魏第285窟“沙弥守戒自杀”因缘故事画中的少女,在北魏第257窟中还是身着龟兹装,而在这里已成了着大袖裙襦的南朝闺秀。故事画中帝王、大臣多着南朝及中原流行的褒衣博带式服装,如五百强盗成佛因缘中的印度萨罗国王,他戴上了中国执法者的首服——獬豸冠(也叫法冠),穿上了深衣袍,手持麈尾,坐在中国式的宫殿里,俨然一位南朝士大夫;几位大臣头戴纱帽,手执笏,着大袖交领束腰曳地长袍,与中原服饰文化可谓一脉相承。

北周时期,虽然反对汉化,但并非抹煞汉化,而是提倡胡汉并举。宇文氏在维护鲜卑旧俗的同时,仍然模仿《周礼》,用六官制度来改组政府,标榜自己是西周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在服装上,虽然幞头靴袍这一影响久远的服饰组合已经初步形成,但是在大朝会等正式场合仍然采用汉魏衣冠,这也充分说明北朝统治者对中原文化的重视程度。

有隋一代,虽然国运短祚,但它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时期之一,它使后汉以降分裂与对峙近4个世纪的中国,重新归于一统。这不但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赢得了难得的机遇,而且也为社会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创造了条件。尤其是隋炀帝之时,河西敦煌作为中原与西域沟通的枢纽,总凑南、北、中三道,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在此汇聚。所以,在隋代的敦煌壁画世俗人物服饰形象上,无论男女,都呈现出两大风格。一类是冠冕衣裳,雍容褒博,譬如男子的朝服、公服,女子的襦裙;一类是紧身合体简洁干练的服装,如男子的幞头靴袍,女子的窄衫裙帔。前者继承了来自中原的汉魏风格,后者则是西域胡风胡俗的变革。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敦煌石窟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的敦煌,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艺术形式上,还是服饰形象上都受到中原文化直接的影响。

在思想内容上,第一,经变画增多,这是中原佛教宗派林立现象在敦煌石窟的反映。中原兴起的各宗派,在唐代前期已通过“赐藏经”、“施写经”、“求遗经”等活动传至敦煌。中原名僧西行,如玄奘经河西去西域取经,昙旷、摩